

最早期中國青銅器

夏代二里頭文化



戴克成著

作者戴克成

授勳：

- 1996: 法國國家藝術文學騎士勳章
- 1998: 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 2001: 法國國家模範軍官勳章
- 2006: 法國國家榮譽軍團軍官勳章
- 2011: 法國國家模範司令勳章

出版書目：

- 甲骨文，書目隨筆與學術報告。法國遠東學院出版，第106冊巴黎1976。
- 瑞士費力堡圖書辦公室（英文，法文，德文版）。
- 古中國青銅器，第一冊：夏，商代，巴黎1995。有彩色，黑白附圖超過370枚。
為後來全套一式三冊之第一冊。第二冊記述周代青銅器。第三冊記述漢代青銅器。
- 中國古代金器，與陝西省考古研究中心局長韓偉教授共同編寫。巴黎阿里斯
2001年10月。
- 玫茵堂珍藏之中國古青銅器，第一冊，附冊及第二冊。香港2013。
- 中國古青銅器淺釋，青銅器在中國文化的重要角色，形製，用途與紋飾，巴黎
2015（英，法，中文版）。
- 以及自1985年以來多展覽會展品目錄。

捐獻：

- 大量捐獻予巴黎吉美博物館。
- 大量捐獻予巴黎賽奴奇博物館。
- 1993年捐獻一11世紀遼代半鏤銀盒子陝西省歷史博物館。
- 2015年捐獻28塊公元前8世紀東周初期金箔飾片子甘肅省博物。

封面內頁：牌飾玫茵堂珍藏

攝影：Vincent Girier Dufoumier (p. 6, 37, 38, 41, 46, 49, 51, 55, 56, 57, 60, 61, 62).

製作與設計：Clémence Artur

插图：Vincent Pradier (p. 12, 19, 22, 23, 25, 26, 27, 44, 47, 52, 53,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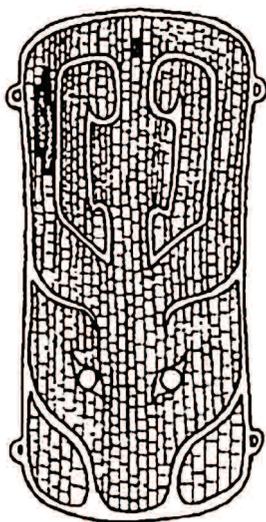
承印商：STIPA

版權所有 - 2020 - Christian Deydier.

版權所人擁有本書所有複製、翻譯與改編之權利。此擁有權涵蓋全球所有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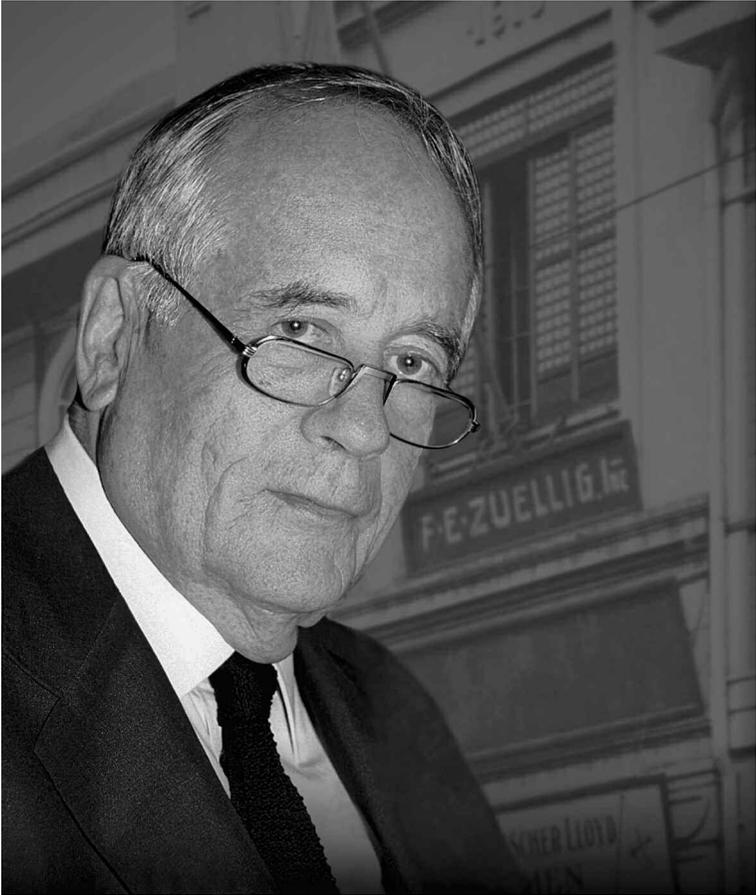
最早期中國青銅器

夏代二里頭文化



戴克成著





獻給我的摯友史提芬裕利博士 **Dr. Stephen Zuellig**

序言

時為1992年第十六屆巴黎古董珠寶雙年展，有一位風度翩翩的紳士欣然踏進我的展攤。這位紳士胸有成足地走到一尊二里崗時期的鬲前面（二里崗時期為商代初期（公元前17/16至14世紀）的一段時期）二話不說，很坦率的告訴我他立意要買下這件珍貴的器物。他還告訴我他遍訪世界無數博物館，也翻盡無數關於古青銅器書籍，決意收集中國的古青銅器。還鄭重地向我表明他已選了我作為他的顧問！

作為他的顧問，我有幸在直至裕利博士今年初去世的25年間輔助裕利博士整合了世界上私人收藏中最重要，最珍貴的中國古青銅器收藏品系列。自一開始以來，博士特別對被視為中國最早期商代青銅器之興趣與投入已為人所共知。這包括了二里崗時代（公元前17/16至14世紀）和更比商早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公元前19世紀至17/16世紀）。

在2017年的七月，裕利博士指示我替他編輯一冊有關二里頭文化的刊物。這主題除了是他的至愛，也志在幫助一些業餘的青銅器收藏家愛好者能對這重要性受人忽略，但形制簡潔，脫落優雅的夏代珍品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

此書實為本人秉承博士指示和意願之下進行的研究結晶。在此我謹把這本書呈獻予裕利博士，以表我對博士的情懷與他對我的誠意的回憶。也希望通過此書能讓新進的收藏家以及普羅大眾獲得對此類古中國最早期的青銅器有更深入的理解與認識。同時更能欣賞夏代青銅器之精髓。

在此也向諸位給予我儘大支持與協助的朋友致謝：一位能給任何物件賜予生命，活靈活現的天才攝影師Vincent Girier Dufournier，助我把這本書從法語翻譯成英語，並在一些關鍵地方提供了考究確認的Ed O'Neill。最後在此向我的助手，由始至終每一階段都一刻無暇替我把關的Clémence Artur，致以最高的謝意。

戴克成



夏代的二里頭文化

中國的考古學家們到今天尚未發現任何夏代時期文字記錄的蛛絲馬跡。故此現今我們對夏代(公元前21-17世紀)的認識幾乎完全局限於那些自夏代遠遠湮滅後才寫成的古代文獻記載的資料。以此類的文獻紀錄作為研究主體基礎。其中尤為重要的應首數公元前5世紀左丘明編撰的“左傳”，公元2世紀司馬遷編撰的“史記”，公元3世紀之“竹書紀年”和南宋哲學家朱熹(1130 - 1200年)所寫的“通鑑綱目”等。

直至20世紀初期，夏代一直曾經被許多非傳統派華人及大多數西方學者視為只是一個神話傳說。但到今天幾乎所有人都承認了夏代這段歷史是真真正正曾經發生過，並就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王朝的真身。

通鑑綱目描述中所謂之夏代歷時439年。從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前1766年。另按竹書紀年所記，則夏代統治下的中國卻只維持了431年。由公元前1989年至公元前1558年。唯時至今天，現代的考古家和科學家大概敲定夏代的統治期間應時自公元前23到公元前17世紀之間。

儘管古代文獻都對夏代皇朝是一個統治期為一段由17位相繼登基的統治者時期的定論一致贊成，但對個別的統治者確切稱號存在了一些分歧；司馬遷稱他們為‘帝’。而其他文獻中則稱他們為‘王’，某些現代教授甚至稱他們為‘侯’。而‘侯’這最後一個稱號出現於當前某些學者的論述的理據是這些學者認為夏代實際上並非為一個君主制度，而是一個部落或國家的聯盟的制度。

大禹

大禹是夏代的第一位君主，也是一手創造夏代的偉大領袖。中國歷史裡的大禹，被評為一位成就無比輝煌卓越的領袖。無論即使以現代標準衡量，他仍然為歷代一直最受中國人民崇敬和景仰的帝君。大禹最備受歌頌的事蹟就是戰勝並駕馭了肆虐大地的水患，再建構了龐大完善的灌溉河道系統網絡。從此把過往的沼澤湖泊化為肥沃的農地，使老百姓能從事耕種。讓夏代的子民能享受到古代中國人前所未有的繁榮，過著富裕和豐盛的生活。

事實上，大禹一直受到後世幾百年繼後王朝的崇敬。華夏的西周（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帝王與他們的子民不僅把他神化，尊為駕馭洪水的天上神靈。就如用漢代的偉大史學家司馬遷所說，作為古代首位統治者大禹的政策成功地將人民的福祉置於堅實的基礎之上。

中國第一件青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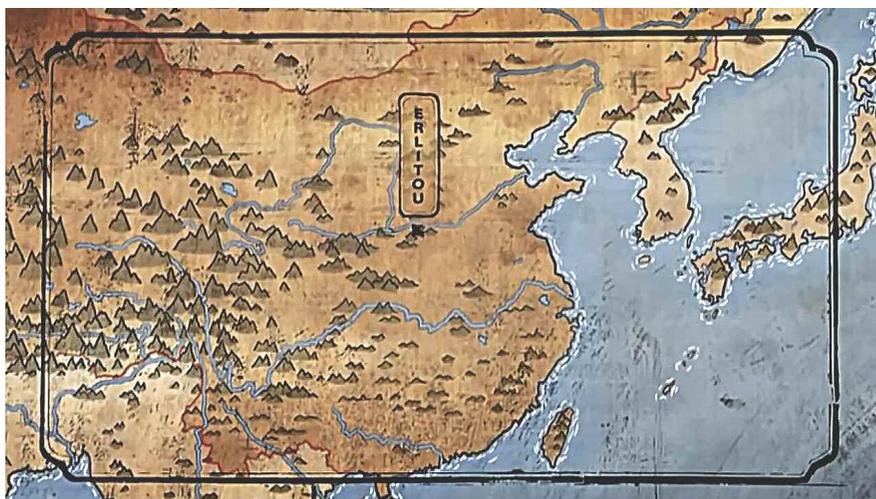
大禹也是中國的文化和科技史上第一位下詔鑄造青銅器的帝王。在光復了為患以久之九大片水泊之地後，他把國家的行政劃分為九個相應的州份。為此他下令在每個州鑄造了一隻瑰麗無比的青銅鼎。這青銅鼎成為大禹及後世統治者絕對統治權力的具體像徵。是作為統一夏代的統治者權力的不容置疑的象徵。司馬遷所記錄下之大禹鑄造九鼎，亦是中國史上首次紀錄生產和使用青銅器的重要文獻紀錄。

二里頭遺址的科學化發掘證實了夏代的曾經真正存在。

證明二里頭遺址及其與夏代民族的聯繫。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這項從1952 - 1953年一直至到1957年於河南省偃師市附近的二里頭遺址發現,發掘和考古的工程計劃,無可否認的是中國考古學裡一項重要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提供了可信的科學證供和證據,證明了夏代的存在。這個王朝迄今為止只被許多現代學者和歷史學家視為是神話傳說,一個出現於古代經典文獻傳說中古遠的王朝。

1952 - 1953年間,於現時河南登封縣玉村發現了現時被稱為“二里頭文化”的首個發現。也根據當時的發現考古專家韓維周,丁伯泉,張寶德撰寫了題為“河南登封縣玉村古文化遺址概況”之考古報告,並於1954年第6期“文物參考資料”中刊登。



這類器物無論在形製和風格上，與現今所發現的並不類同。不僅與安陽小屯的器物不同，且與鄭州二里崗遺址所發現的器物也大相逕庭。隨後在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鄭州附近的洛達廟，洛陽東乾溝，夏縣以及鄰近山西省西南部地區。附近的挖掘工作發現了形製和樣式相同的器物。

在所有這些遺址中，河南省偃師二里頭的遺址是地域面積最大，層次最深的遺址。所發現的器物既以數量，形製及造型風格都別聊一格。為此考古學家決定將他們的新發現命名為“二里頭文化”。從而區分這些個別遺址的文物和他們過往二里岡和安陽發現的商代文物。受到最初發現的啟發和鼓舞再加上根據古書對夏民族的記載，在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帶同了大批考古學家在今河南豫西和毗鄰的山西省西南部進行更廣泛的發掘工作。

他們選擇這些地點有合理原因。古書把這些地點準確地記載。按古書的描述，夏民族棲息之地大概位於山西省的澮水和涑水一帶。故此夏族的故鄉應就在此地。這個地區在左丘明的左傳中稱為 '夏墟'。同時公元前300年度邑解的逸周書，公元前94年司馬遷在史記中周本紀提及過。是位於河南省洛河，伊河之間的地區。

在史記裡，司馬遷進一步提出夏文化起源於現今河南省東部的黃河流域。司馬遷更加引述了周武王（公元前1066 - 1063年在位）的話，說道“伊，洛河之間是為夏民族發源地”。

1959年徐旭生領導的考古隊最重要的成果是在今河南省洛陽附近的偃師發現了中國最早期的大型宮殿遺址 - 推斷古至二里頭時期晚期。之後上述遺址中在1960年至1964年, 1972年, 1973, 1975之後從1980年開始, 每年間都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掘。

至此, 考古學家們現在對二里頭文化的演變和發展已有了比較準確和深入的了解。二里頭文化現在大多數學者都公認二里頭文化是中國第一個朝代, 亦即夏代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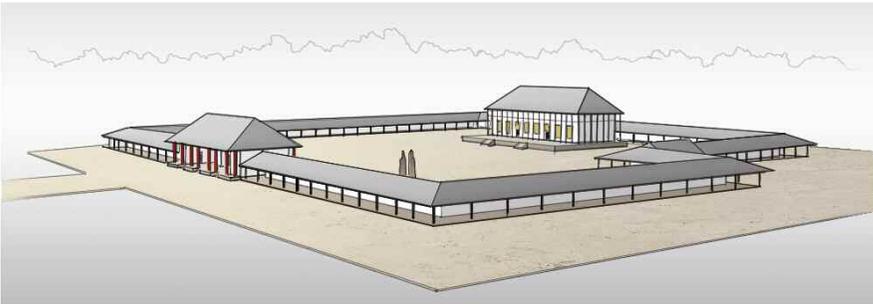
迄今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面積覆蓋寬1.5公里, 總2.5公里, 發掘的發現包括了下列的文物:

甲。下列各類型的建築遺址;

- 巨大房屋的基礎地基, 更貼切應稱為“宮殿”。現在遺留只有大型矩形的夯土地台。
- 較小型房屋的或普通住宅的基礎地基, 其中部分為地下室。
- 糧倉炕
- 陶窯遺址
- 綠松石頭加工工作坊遺跡
- 舖上礫石或夯土的道路遺址
- 水井
- 不同形狀和用途, 用以葬人之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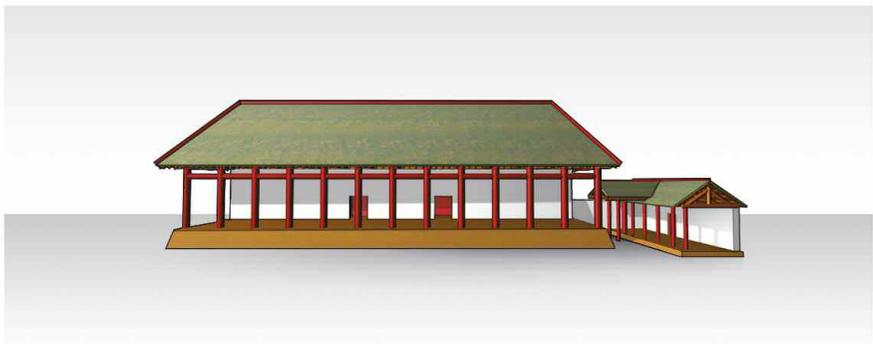
大殿

在二里頭遺址進行的科學發掘揭露了矩形的夯土地地基都座向南北。這些宏偉的建築物與宮殿看來皆只用木頭構建作基礎，在古代的建築技術較為常見。



第四號宮殿

第一座宮殿的遺址在1960年被發現。這座建築的地基幾乎是正方形。寬達108米，長100米，地基深度都在1米到2米之間。由每層厚度為4.5厘米的地層組成。這些地基對比周圍土壤地平幾乎高出了80厘米。其他的文物顯示這座宮殿曾被一座高約45至60厘米的土質圍牆所包圍。考古學家發現了一系列的洞穴與平台邊緣平行並列，估計最有可能是為了嵌入支撐一條長長的有蓋走廊的木柱而挖，這走廊大門口朝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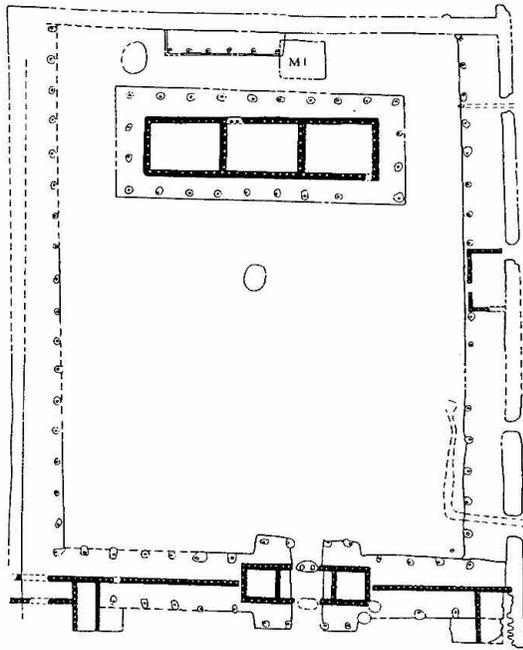


第四號宮殿

右頁：圖示二至五號宮殿地基



同年後期發掘出第二座建築物的基礎,稱為2號宮殿。第2號位於第一“宮殿”遺址東北約150米處。比第一座'宮殿'保存更良好和更小。這些遺址包括一個方形平台,每邊大約33米。在對該遺址進行仔細研究後,考古學家在宮殿中央北部的一座走廊中終於成功重組出一幅實在,兼可信性高的原始宮殿面貌。該宮殿由三部分組成,三部分都以外部陽台台的形式延伸出原始建築的外部。同樣地,建築物南端的雙走廊也從朝南的大門延伸出一個陽台。在原本建築物的中央部分,發現了一由赤土陶管管道組成的排水系統。



二號宮殿圖

自1999年以來,發掘主要圍繞早期發現建築物和房屋地基與街道等遺址的範圍。最後考古學家們發現了頗多其他的類似基礎。

樓房

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大量一般樓房的遺跡。儘管大小各不相同，某些相當長並且包含多個房間，但都是坐落在矩形地基上。考古學家認為這些規模的差異表明夏族社會中存在階級制度甚至存在了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的社會秩序的威權勢力。而此勢力應該同時在推動和執行這種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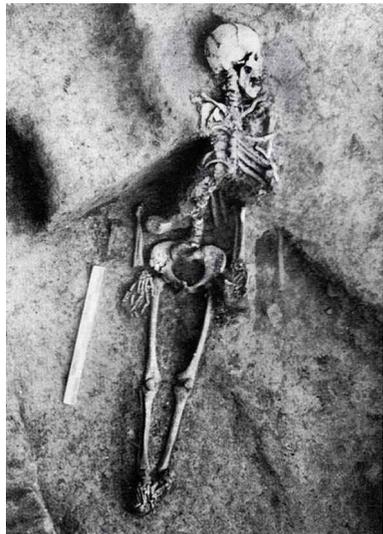
2002 VF75號樓房地基

陵墓

考古學家在現場挖出了幾種不同的陵墓，有些長方形，而另一些則是圓形。此外，這些墳墓的深度各不相同，其中的骸骨或部分物品顯示埋葬在墳墓的屍體經許多不同的方式埋葬並被置於不同的位置。某些墳墓的情況強烈顯示了死者為暴力致死。一些骷髏頭骨清楚表明被斬首，身首異處。有些情況表明死者被活埋。夏民族社會重要成員的豪華墳墓，埋藏了無數的陪葬品。主要如漆器棺材，硃砂碎片，玉器和骨頭等。有時也會挖出一件，甚至有時會有幾件青銅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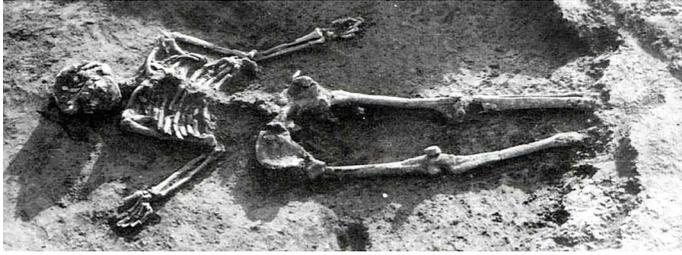
IV M19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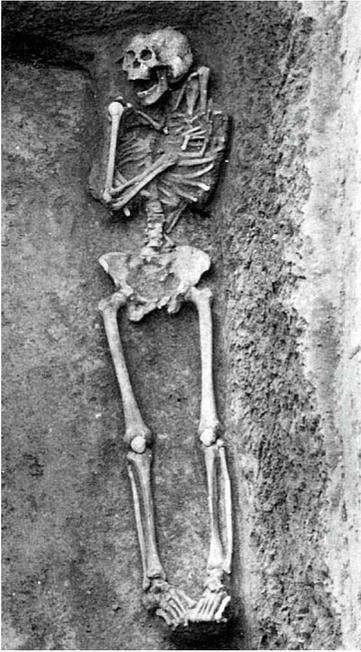
V M208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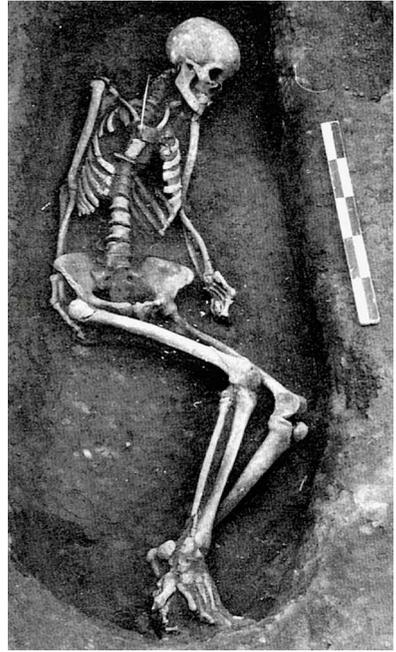
V M57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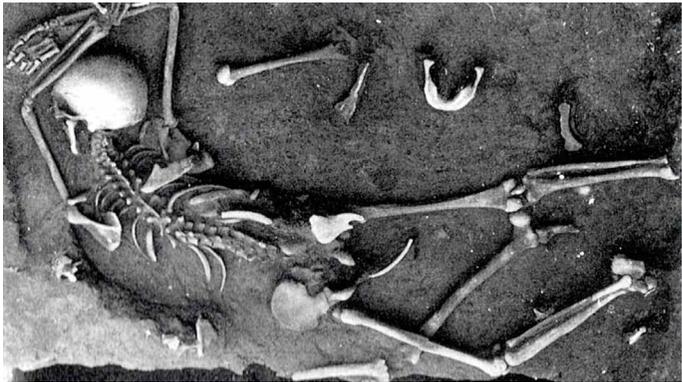
V M60號墓



V M61號墓



V M56號墓



V M204號墓

二里頭遺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二里頭遺址的發現以及對該地區的定期考古考察不僅讓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迄今為止半神話般的夏族民族有了更透徹,更實際的瞭解,而且也帶來了現中國史上第一批生產青銅器的成果。大多數現代專家把這些器物歸納夏代(公元前21 - 17/16世紀)的青銅器。

發現第一批青銅器

1972年10月至1973年在該地進行的挖掘工作揭開了宮殿的基礎的神秘面紗,也挖出了些古物。其中包括矛尖,刀,魚鉤,戈和戟等。但最重要的發現是一隻禮儀用的銅爵。此尊爵 (VIII T22 3:6) 為中國史上第一尊經科學考古發掘出來的早期青銅器物。它高12釐米,壁厚特薄,厚度僅僅0.1釐米。成分為92%銅和7%的錫的合金鑄造而成。發掘出來的其中一些工具材料成分是由98%的銅和1%的錫組成的合金鑄造。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金屬器物都是從現場的第三層中出土。



爵 VIII T 22 3:6

1975年秋季中進行的考古工作發現了三座墓(75 YLVIK M3:5),這三座墓都可以追溯到二里頭三期。墓中陪葬品包括玉器,骨器,銅器與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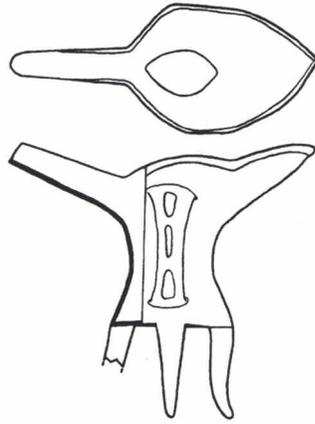
該群墓中最大為k3號墓(Tomb K3),也最令人產生興趣。原因是它包含一個2.3米×1.26米的大型矩形溝。深度1米至1.26米,與另一條較小的溝1.7米×0.74米接壤,深度在1.38至1.44米。較大的溝埋有青銅器,陶器和綠松石。較小的相鄰溝渠則包埋有玉器,青銅器和容器,幾件骨頭做的文物,貝殼和綠松石。



1975年考古隊最重要的發現是兩個青銅的三足爵杯。其中一個狀態相當良好，另一個化為碎片。較好的三足爵總高13.5厘米，體壁厚1毫米，三跟足高5厘米，流長5.7厘米。器物提樑寬，有三處穿孔。



照片：爵III M2:2 1980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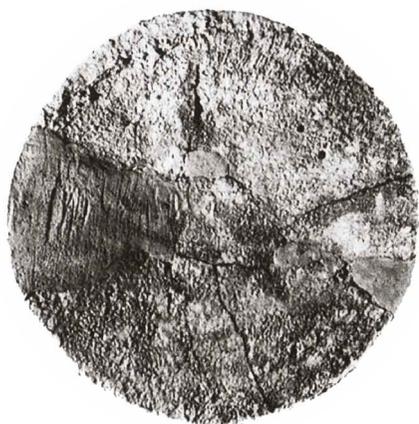
插圖：爵 YLVIK M3:4形制

在K3墓中發現其他青銅器物有兩個直徑11.6厘米，厚0.1厘米的圓形扁平形狀的器物。其中一個飾面開有三個孔，另一個飾面有殘餘木質和綠松石的痕跡。正如一些考古學家所言，這些薄而圓的器物很可能是銅鏡的雛形。銅鏡後來在中國尤其戰國時代（公元前475 - 221年），秦代（公元前221 - 206年），漢（公元前206年 - 公元220年）及其後的中國歷史裡都大受歡迎。

1980年秋季進行的發掘行動集中在二里頭遺址的第三區。這次行動所取得主要成就是二里頭第三期三號墓M2:2的發掘得到的成果。雖然墓址相當小，長度只有2.55米，寬度1.20米。但墓地III M2:2卻提供了豐富的開採成果，尤其是出土的青銅器。

考古學家發現了兩把青銅刀鋒，一把長18.4厘米，另一把26.2厘米。尚有兩件禮樂青銅器，為兩只三足爵。其一高18.4厘米，另一高22.4厘米，造型優美。兩只中間部分都呈飽滿，較短，上部主體細長，凹進。其上部主體的一側上附有長而寬的穿孔手柄，狹長的流從頂部口緣延伸。三根呈往外彎的錐形足從中間部分伸出。

下一個考察團的發掘從1980年冬季一直持續到1981年的春天。大家也將重點集中第三期的區域。這次考古學家從二里頭第二、三和四期遺址發現了大量陶器，但完全沒有青銅器出土。



青銅鏡早期錐形? VI KM4:27



青銅鏡早期錐形? VI KM3:9

繼續下來的開採於1981年下半年進行。範圍集中於V區。這次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第二期 (M4和M5墓), 第三期 (陵墓M1和M3) 以及第四期 (M6號墓) 的一系列陵墓。其中第二期的古墓M4出土的幾件器物, 大大增加了我們對夏代的認識和了解。其中有一個8.5厘米高的青銅鈴 (81 YLV M4:8) 和一個綠松石鑲嵌的青銅牌飾, 牌飾形制略帶拱形鑲嵌有綠松石 (81 YLV M 4:5) 長14.2厘米。當從上俯瞰時, 綠松石和將青綠色的碎片經青銅細絲分割成若干部分, 形成饕餮圖。

饕餮擁有又大又圓, 凸出的眼睛和頭上高高的向內捲曲的角。在發現此牌飾之前, 類似器物只見於西方私人收藏品中。但礙於無知和缺乏考據, 這些器物錯誤地被視為較晚期的文物。



81 YLV M4:5號牌飾



M11:7 號牌飾



罍 M9:1

在M4號墓中出土的青銅鈴和綠松石鑲嵌牌飾，為中國青銅器鑄造的演變及進化提供了迄今為止那“缺失的環節”，並讓考古學家清楚了解晚期中國青銅器中饗餐面具雛形的來源。

1984年秋季考古工作集中發掘二里頭第三期的一些墓址。從M6, M9和M11中發現了幾個重要陪葬品：

- 爵1984 4L V1 M6:5
- 罍1984 4L V1 M9:1
- 銅牌19844L VI M11:7
- 小青銅鈴1984 4L VI M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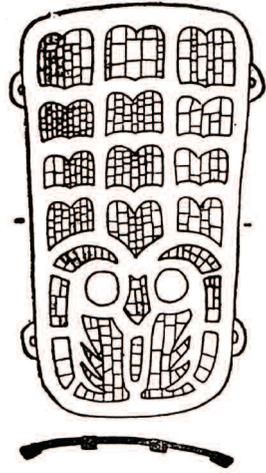


鈴 M11:2



爵 M6:5

- 在M6號墓中，考古學家們發現了一件陶製的盃，同時發現了一隻青銅爵。
- M9號墓挖出兩件陶盃，一只青銅爵 (M9:2) 和一個青銅製的罍 (M9:1)，這是該地經科學化發掘中出土的第一件可以推論為二里頭文化的文物出土青銅器物。
- M11墓提供了最豐富和最多規格標準的文物。其中包含了陶造的盃，一只青銅爵 (M11:1)，青銅鈴 (M11:2) 以及飾有綠松石饗餐圖案的青銅銅牌匾 (M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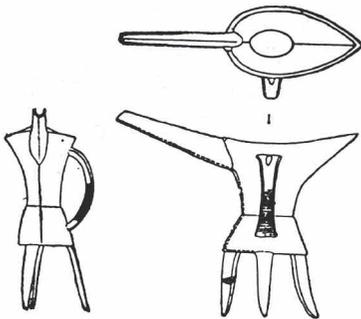


銅牌 M57:4描繪圖



鈴 M57:3

在1986年秋至1987年春季，進行了對幾個二里頭文化二，三，四期墓址的發掘工作。收穫最豐富的是M57號墓，追溯到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時代。其中包括8件玉器，9件陶器。其中一件是盃。還有4件青銅器，其中一件是爵 (M57:1) 高16.4厘米，小銅鈴 (M57:3) 高8.45厘米，鑲坎綠松石的青銅牌飾 (M57:4)，長15.9厘米，還有一把青銅刀 (M57:2) 34厘米長。



描繪圖：爵 M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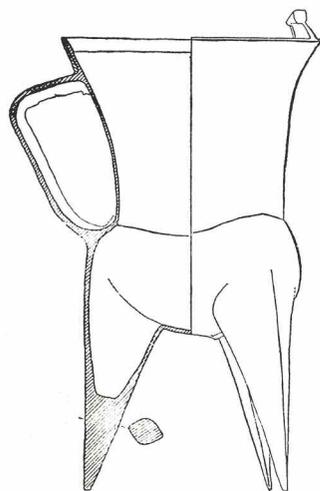


爵 M57:1

右頁：M57:4號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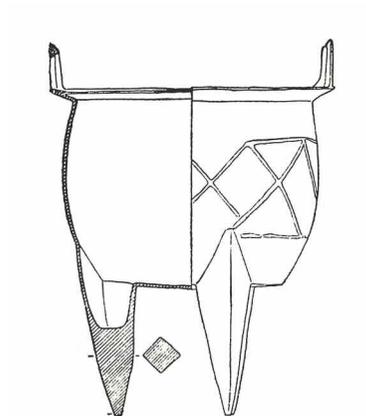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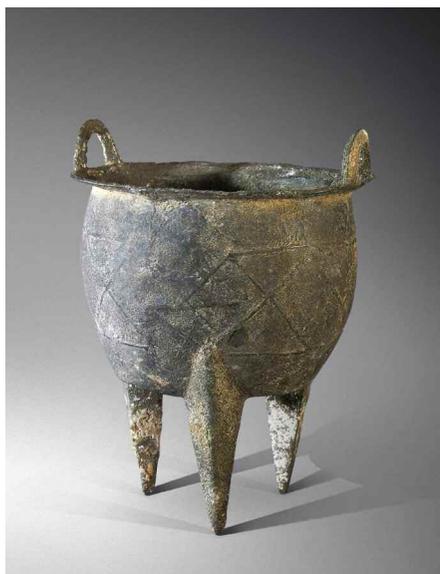
在1987年春季的挖掘工作中，從墓87 YLV M1發現的陪葬品對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大的線索和啟發。陵墓屬於二里頭四期。出現了兩件重要禮樂青銅器，一隻是罍，另一隻鼎。兩者形製和構造都為考古學家迄今前所未。尤其是鼎，應是早期有系統的發掘首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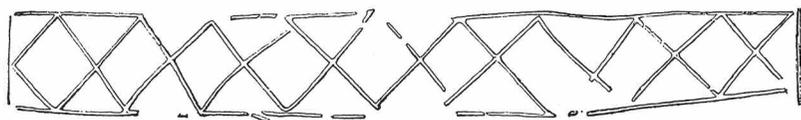
罍 87 YLV M1:2附草圖。

- 此高26.8厘米的罍 (87 YLV M1:2) 無論形製和構造與1984年同一地點發現的罍大不相同。1987年的罍凸底及三足皆中空。圓形的三角形。非常類似於禮樂器物鬲 (參見第?頁)。故此它可被視及後所有二里崗時期 (公元前17/16 - 14世紀) 青銅器形制的鼻祖。

- 鼎 (87YLV M1:1) 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第一件此形制之器物。它高25厘米，呈深圓形，薄壁碗狀，附有兩個弧形手柄。其上緣兩側各一手柄，平底，附以三根中空，圓潤，三角形尖狀足。器物表面飾有一系列輕微拱起的三角形網狀紋飾。



鼎 87 YLV M1:1附草圖，浮雕覆蓋軀體中部。



從1988年開始，在此處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研究宮殿遺址的基礎地基，四周牆壁，道路，疑似運河系統和其他可能幫助考古學家更了解這座城市的基本佈局和演變的元素。很可能此處為夏代首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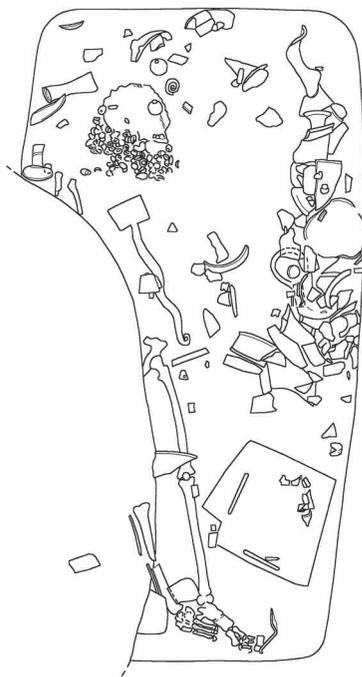
中國最古老的龍

2002年春，在二里頭遺址的02VM3挖掘工作時，出現了中國考古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出土了一條由2000多塊綠松石組成的長龍，縱向放置在墓主人骸骨的肩膀和腰圍之間。墓主人很可能是當時夏代社會貴族。這位30-35歲的男性墓主人是按當時的葬俗作縱向安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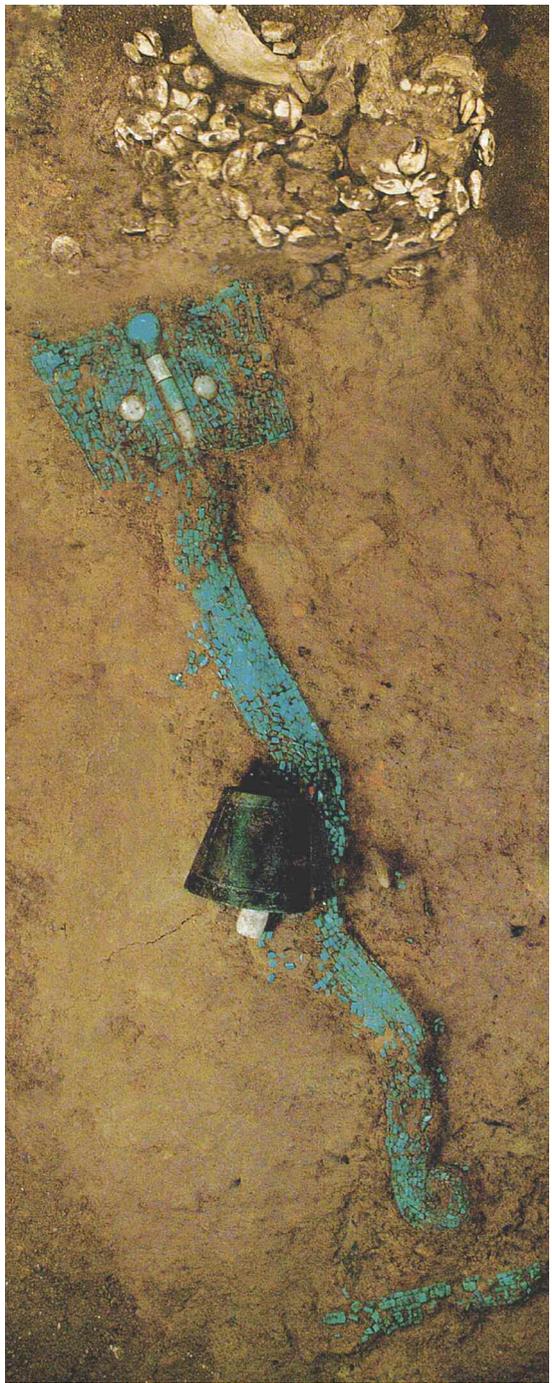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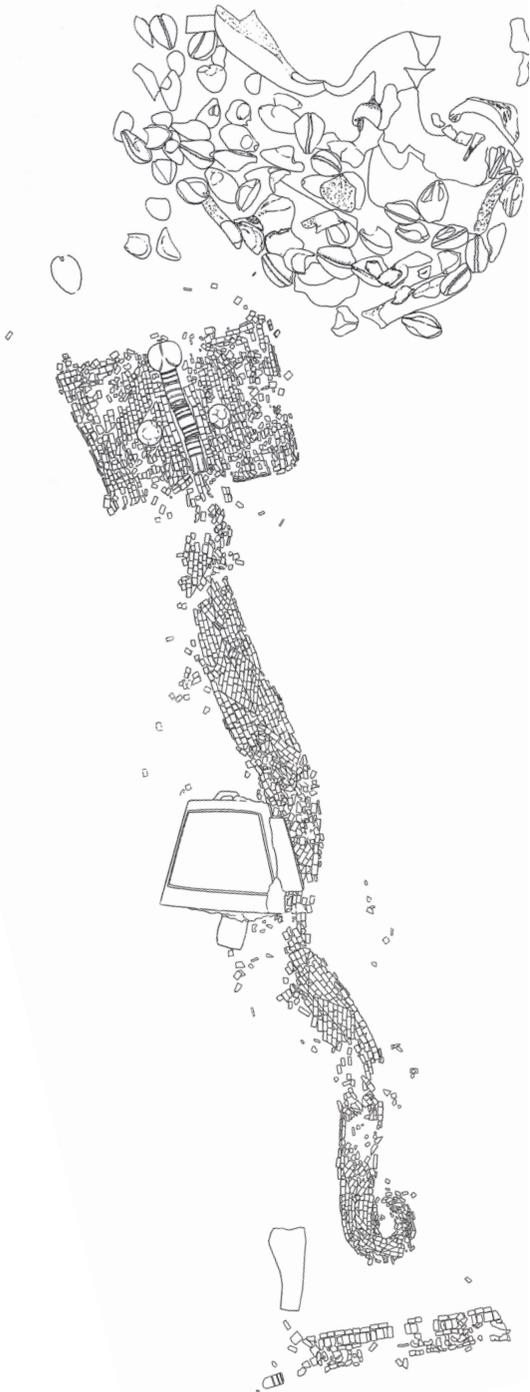
當今中國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對自夏至今龍的重要性有許多流行的理論。一些人相信二里頭遺址陵墓02VM3中綠松石龍的發現似乎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相信夏人崇拜。在看到突然的閃電，長長起伏閃電像龍一般，穿透了暗黑的夜空。隨著而來的是生命的降雨，代表生命的開始。龍就是天體神靈真身的現身，被視為夏人的保護神和恩人。

此龍上的綠松石最初附著於現在已經完全瓦解了的飾牌上，並各有個別不同的形狀和尺寸。長度在0.2厘米至0.9厘米之間。平均厚度為0.1厘米。這個64.5厘米長的龍顯示了一個起伏的軀體，頭部是一個15.6厘米長的大矩形頭，寬度11到13.6厘米不等。龍頭上鑲嵌著兩顆又圓又大的眼睛，以白玉嵌鑲，一個長長的鼻子由三塊長而狹長的白玉飾牌組成。頂部飾上一塊大圓形綠松石雕塑。

這條美艷而且工藝無與倫比的巨龍為考古學者提供了對夏人文化意義的實質證據，為到此為止新石器時代文化與商代之間提供了那“缺失的環節”。



02VM3號墓草圖



02VM3號墓詳細圖

二里頭文化的遺址

現在被稱為“二里頭文化”的單一文化實體，由近500個考古遺址組成。它們分佈在黃河流域及其支流的若干地區，鄰近的現代省市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區位於伊和洛河之間的(伊、洛二水之間)靠近現時的鄭州以及山西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以及甘肅省。

雖然二里頭偃師遺址是迄今所有二里頭文化遺址中最重要遺址，另有兩處遺址也特別值得一提。主要因為這兩處可能是夏代都城遺址

- 河南省登封附近的王城崗遺址，發掘出一座土城牆的遺跡。
- 東下馮遺址，位處夏縣，是山西省最大，最豐富二里頭文物的文化遺址。在此處出土了一座古城遺址，周圍環繞著由壓縮土建造的城牆遺跡。經碳14化驗，驗明大概歷史從公元前3世紀末開始到公元前2000年早期。

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各個時期

考古學家按現場的土壤層和每個地層所出土的文物，將二里頭遺址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

上兩層被分類為屬於二里頭文化原始階段，特點是出現大量附淺浮雕裝飾灰陶器物。

此類文物在河南省汝州臨汝鎮的煤山遺址以及偃師二里頭遺址都有發現。從這兩處遺址出土的文物看來，很明顯地此兩地的二里頭文化早期陶器受良渚文化和龍山文化新石器時代的強烈影響。

第一期

這段期間的二里頭已成為一個佔地約100公頃(247英畝)的地區權力中心。屬於這一時期的地層挖掘出的陶器基本上都是灰色或黑色,其中一些有經拋光的痕跡。基本的形制都是盤,甑,罐或三足盤等。這些器物都有繩紋飾,有時還帶有按壓紋飾。

在河南省浙川下王崗的同期土壤層中也發現了青銅殘渣和碎片。

第一期土壤層經碳14化驗,估計約為公元前1900年。

第二期

顯示了二里頭城市化時期當時城區總面積擴大到約300公頃(約741英畝)。地層挖出的建築物遺址發掘出一座面積為12公頃(面積29.65英畝)的“宮殿”,四面由道路圍繞。

考古學家注意到這個地層中發現的灰陶比例有所增加,同時經拋光黑陶器也相應減少。器物軀體也變得不那麼大,更扁向垂直圓柱形。頸部口緣向內翻,底部肥大。有流的灰陶盃開始在這土壤層中出現。

1981年發掘的二里頭遺址,被專家們認定為二里頭文化第三期。位處第5區的M4墓中發現了一個小型銅鈴(81 YLV M4:8),一個鑲嵌有綠松石的青銅牌飾(81 YLV M4:5),青銅牌帶有饕餮面紋飾。令在場參與現場工作的專家們相當興奮。

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第三, 四期

二里頭文化晚期兩段期間與其早期階段最大的差異是文物的顯著增加, 其中包括:

- 石圍雕;
- 骨器物, 包括髮簪和一件帶有紋飾, 長而扁平的器物;
- 漆板, 即使已經朽爛, 尚存部分仍然現出塗漆和紅漆的痕跡;
- 玉器, 無數玉器件, 經過頗精工的拋光, 證明了製作技巧已經相當完善和成熟。在這些玉器件中, 有不少紋有動物面具浮雕的扶手, 以及一些刀刃和璋;
- 青銅器, 從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演變的角度來看, 最重要的發現是在第三期和第四期出土文物發現了眾多青銅器器物, 包括刀刃, 剪刀, 鑿子, 矛尖等。特別是第一批有系統挖掘出土的中國古代禮樂器: 爵, 罍, 鼎和帶流的盃。所有這些器物證明中國已經在二里頭文化晚期進入了青銅器時代。

第三期

第三期是指二里頭村人口達到18,000至30,000人口的時期。標誌著這種文化演變的一個重要拐點。當時宮殿已擁有一座高2米的土牆作為保護。也造出了各種新品種陶器。更最主要的是開始了正規以及有計劃的青銅器的製作。

二里頭文化時期出現並迅速普及新形制的陶器有鬲, 罍, 樽, 簋, 甕, 鼎, 豆, 甑等。

人們通常在器物上加以簡單的裝飾, 例如紋上梳子狀或繩狀紋飾。器物的原材料從早期的偏黑銳化為灰色。

青銅器在同一時間開始面世。但據馬承源教授重申強調, 這些最早期的青銅器所顯示的精細度讓人懷疑如何能於未經長時間準備和未有反覆從錯誤中學習測試的情況下可以突飛猛進。因此大家尚對中國青銅器生產史的一些空白和遺漏, 期盼考古學者的新發現能填補這些空白。

到目前為止, 考古學家已經發掘出許多遺留青銅器物, 模具碎片和一些小型的青銅器件如青銅刀, 鑿子, 剪刀, 箭頭, 長矛和小鈴等。

第四期

然而在這期間仍挖出更新型的陶瓷器物。它們的出現逐漸取代了二里頭文化的第一和第二期中最常見的形制。造型開始更近似後期二里崗文化中的陶瓷器物的形制 (大約公元前17/16-14世紀)。至此我們開始進入商代 (大約公元前17/16 - 12/11世紀) 承傳夏代的新紀元 (大約21日至17日) / (公元前16世紀)。

二里頭文化第四期間三足鬲等器物產量更大, 形制也更加標準化。

雖然數量尚還不如陶器, 但青銅爵, 罍, 鼎和盃等器物比第三期時更為普遍。

專家對其中一從4期土壤層挖出的器物ZK286進行了碳14測試, 測出為第4期時間為公元前1625 ±130年的物品。

有關二里頭的爭議

儘管許多或甚至大多數中國考古學家認為二里頭文化遺址屬於夏代，但仍有很多考古學家質疑這種推斷。

由於缺乏當時的文獻記錄或實質和具體證據證明二里頭遺址所在地實際上就是夏人民棲息聚居的實在位置，故此爭議仍然存在。也許解決這個爭議的唯一合理方法是對現存古代文獻中的資料與二里頭遺址的實際位置進行更深入比較和印證。探討它們如何匹配，才再嘗試解釋二里頭的文化層去研究這些遺址之間是否存在早期文化層（從第一期和第二期）到晚期（所謂第三期和第四期）之間的斷層或不連貫性。

現實存在了三種主要的理論，各自表述，爭取認受。

理論一：

二里頭文化等於夏文化。

一批考古學家將整個二里頭文化明確和毫無保留地歸屬於夏人。他們把這四個文化層之間出現之斷層或不連貫性解釋為是商人的入侵佔據所致，或推論夏人遷都該地而引致有這差異。

理論二：

二里頭遺址的早期土壤層屬於夏代，後期土壤層屬商代初期。

對於那些堅持這一理論的人來說，現場的地層的不連貫性被解釋為王朝中斷。而夏文化最繁榮的晚期剛正受新勢力冒升的商代所影響。

理論三：

龍山文化的結束和豫西二里頭文化的開始與夏代相應，但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末期與二里崗時期的開始直接相關。相等於商代的開端。

儘管上述理論都存在差異，但起碼在有關二里頭的早期階段這議題（即第一期和第二期）大家似乎已達成共識，所有人同意屬於夏代時期。

考慮的重點：

儘管缺乏與夏代實際相符的當代文獻記錄，但考古學家們確實有幾個不爭的事實支持他們論調。

二里頭文化所延申的時期有異於東方龍山文化的時期。儘管二里頭文化比龍山文化進化程度更成熟，二里頭文化却源於龍山文化。同時與後期之齊家文化相承，有重要的聯繫。

從那眾多二里頭文化發掘遺址與提及有關夏人的古文獻中，傳統的分佈顯然不謀而合。儘管推論將二里頭遺址四期定在夏或商兩代，但從碳¹⁴測試結果中獲得的信息中我們獲得了一個更精確的遺址，以及能作出當時文化繁盛的斷代。

碳¹⁴測試表明二里頭遺址的四個時期持續了約500年。從第一期的1920 B.C. ±140年 / 1900 B.C. ±130年開始，持續到第四期的1625 B.C. ±130年（器物樣本ZK286）。

放射性碳測試從鄭州商文化遺址和二里崗那邊也產生了一些有趣的結果：

- 鄭州 (取自圍牆樣本CET7): 1620年 B.C. \pm 140年
- 二里崗 (第三土壤層, 樣本 ZK717) 1595 B.C. \pm 140年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洛達廟和南關外的鄭州商城遺址處在二里崗文化地層下, 挖出二里頭文化層。

這就是說, 通過放射性碳測試獲得的結果顯示, 所測試的樣品是早於商代二里崗時期, 並且毫無疑問地相應於夏代的時期。

綜上所述, 放射性碳測試結果證明二里頭文化先於二里崗, 二里頭遺址的四個時期完全符合夏代的推斷範圍。





中國青銅鑄造的起源

中國古代的經典文獻與傳說將中國青銅器鑄造的起源歸功於夏代創始人大禹。他被譽為鑄造了九尊青銅鼎作為他的超凡力量的象徵，分發到夏地的九州。

過去100多年的考古發現中，儘管尚未發現大禹原來的九鼎，但過程卻使我們對中國古代冶煉金屬合金的演變與發展有了相當清晰的瞭解。二里頭/夏代二里頭時期的第一批禮樂青銅器出土，更加強專家的信心與識。儘管仍然存在一些缺失的環節，我們現在對演變過程可以作出如下的總結：

- 仰韶文化 (大約公元前5000 - 3000年), 位於現今甘肅省到河南省與甘肅省之間的地區。其中心為從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延伸至豫西晉南地區陝西省寶雞市, 即現代陝西省寶雞市。

在陝西省西安市東郊的仰韶半坡文化遺址 (大約公元前4800 - 4300年), 在臨潼姜寨發現一個小黃銅顆粒和一個管狀黃銅器物。陝西渭南北劉仰韶半坡文化遺址發現的黃銅髮夾都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姜寨發現的一個盤, 也可追溯到大約公元前五千年。這個盤的成分由65%的銅和25%的鋅合金構成。

- 龍山文化 (大約公元前2500 - 1900年), 位於現今山東, 河南, 陝西, 河北, 遼東, 江蘇省分等地區。

自1955年起, 從當地河北省唐山市大成山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幾件金屬文物為銅合金混合物製成。山東省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小器物, 推斷源於公元前3000年至2200年。由銅和鋅的合金製作。

- 馬家窯 (約公元前3800 - 2050年) 位於現今甘肅省西部, 青海省東部和四川北部的川北部。

甘肅東鄉林家出土了一把小青銅刀, 古至公元前3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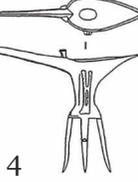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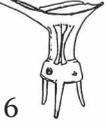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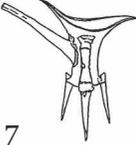
- 齊家文化 (約公元前2,050 - 1,700年), 位於今天甘肅省青海東部和寧夏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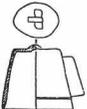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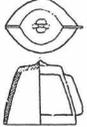
由於齊家文化的歷史遠至“青銅器時代”, 因此在這個時期的遺址中發現的大量青銅做的工具, 武器 (斧頭和刀具) 以及其他小型青銅器物完全不足為奇。

- 二里頭文化 (大約十九世紀至十七世紀至十六世紀), 位於今河南省豫西西部和山西省南部。

專家們在二里頭遺址第一期地層發現了青銅器碎片, 但迄今並無發掘出二里頭文化的第三期前的青銅器碎片。



	爵		角盃	罍	
二里頭 土層 2					
二里頭 土層 3	1  2 	5 			
二里頭 土層 4	3  4 	6 	7  8 	9 	10 

盃	鼎	鈴		牌飾
		 13	 15	 18
				 17
 11	 12	 14	 16	 19

N° 1 : 1973 YLVIII22 3:6

N° 2 : 1980 YLIIM2:1

N° 3 : 1984 YLVIM6:5

N° 4 : 1975 YLVIIKM7:1

N° 5 : 1980 YLIIM2:2

N° 6 : 天津博物館

N° 7 : 陝西歷史博物館

N° 8 : 上海博物館

N° 9 : 1987 YLVM1:2

N° 10 : 1984 YLVIM9:2

N° 11 : 1986 YLIIM11:1

N° 12 : 1987 YLVM1:1

N° 13 : 1982 YLIXM4:1

N° 14 : 1984 YLVIM11:2

N° 15 : 1981 YLVM4:8

N° 16 : 1987 YLVIM57:3

N° 17 : 1982 YLVM22:11

N° 18 : 1981 YLVM4:5

N° 19 : 1987 YLVIM57:4



爵 玫茵堂珍藏

夏代青銅器

雖然大家對於中國青銅鑄造的起源還有不盡知之處，但二里頭文化初期的青銅廢料和青銅器物碎片已在各遺址如河南浙川下王崗等紛紛出土。

正如前述早期二里頭二期的小青銅鈴和綠松石鑲嵌青銅牌飾等就已存在。唯青銅禮樂器物卻要到二里頭三期才開始出現。大家想當然地猜測早期的青銅鑄造技術應該相原始。但事實上技術相當先進成熟。我們看到二里頭三期的物證明了當時工匠具備精湛技術，能生產高品質，繁複的青銅器。而器物的美態與造型更加應歸功他們已經擁有多模鑄造方面的高超技術，遺留下這些巧奪天工的傑作以供後世欣賞讚嘆。

按我們已知的部分再加上從考古學家科學發掘的資料看起來，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器皿是商代青銅器的祖先。它們在文化和歷史上顯然是有聯繫的。故此我們可以安心地告訴大家它們是夏代後期的產品。夏代的青銅禮器只有四個類型，即爵，大罍，鼎和盃。除此以外，也有鑲嵌綠松石鑲嵌青銅牌飾，小銅鈴和青銅的兵器和工具等。

爵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1972 - 1973年二里頭遺址上出土的第一個盛酒的古銅爵是該遺址發現中最重要的文物。它提供了實質的證據，證明比我們想像中更早的時期在中國大家已經在製造複雜的青銅器皿。

二里頭遺址直到現在出土的十幾件銅爵中，只有一件有紋飾。在1975年夏天出土時，它的手柄另一面裝飾著圓形凸起的飾帶，上面有一道淺淺的浮雕。圖案通過在模具內部蝕刻而成，引證了早期的鑄造技術已經非常先進。

夏代最古老的禮樂青銅爵形制主要為薄壁(1釐米厚),三足,口緣一邊附有一根直,長,像水溝的流。流附著口緣壁邊的接合處每邊有一鼓起蘑菇狀裝飾覆蓋。器物的軀體往上伸展漸呈收窄,底部如雞蛋圓潤球根狀。往上至口緣時擴闊。整件器物由三根三角形的尖足支撐。器物一邊附有半弧形手柄。

隨著二里頭演變的各個時期,爵的形制經歷了幾個重要的變化,可以概括如下:

- 二里頭遺址第三期三第層出土的爵較小型,呈蹲下型態;三角足很小,而且流口很短。



爵 玫茵堂珍藏



爵 玫茵堂珍藏

- 在三期末至二里頭四期開始的期間，爵的流變得更大，與其餘部分看起來有點不相稱。這類爵的一個非常吸引人的例子見於玫茵堂藏品系列（見圖）。爵的形制整體呈下蹲的姿勢。瘦身和修長的流造出整體優雅，脫俗的效果。再次見證了夏代青銅鑄匠的傑出技藝。
- 到了二里頭第四期，大型禮樂青銅爵首次亮相。此爵特點在於有一只非常長窄的流和三根更長和更壯的三角足。這些巨型，流口特長的爵尤為罕見。1980年首次在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的中國青銅器大型展覽。（參見展附錄第79頁第一項）；另一個類似的大型爵曾於2013年在巴黎吉美博物館展出，現已成為玫茵堂藏品。此大型爵也出現於戴克成先生 (Deydier Ch.) 2016年巴黎出版的 *Initiation aux Bronzes archaïques chinois* (中國古青銅器入門) 第69頁中。

要鑄造出這種青銅爵，極有可能需要四件套模具。製作過程中使用的合金由92%銅和7%錫等混合而成。



罍

到目前為止，在二里頭遺址至少有六件夏代的青銅罍出土。

其中最古老也是第一只被發現的年代久遠至二里頭第三期。是在1984年挖掘M9墓的過程中發現。高30.5厘米，這罍具有薄壁，中心收窄，一邊有一根半弧形的垂直手柄和上緣兩個物蓋上小蘑菇飾帽。

另一個罍是1987年從87 YLV M1號墓發掘出來。斷代為二里頭第四期初。形制上它與上海博物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品的罍或戴克成 Deydier Ch. 在1991年11月發行的 *Oriental Art* 雜誌封底所展示的非常類同。即如其他罍一樣，87 YLV M1號墓中發現的罍有一個圓形鼓起的下半身，上部較窄，呈直線。修到接近頂部口緣部位時逐漸向外。形體由三根空心的錐形足托起，足形與鬲非常相近。

玫茵堂藏品中二里頭時期的罍，與二里頭遺址發現非常相似。但形制多出一個附加元素特徵。其為器物中間位置附近的裝飾兩條水平淺浮雕帶狀紋飾，包圍著一組幾乎不能察覺的小圓圈。



罍 玫茵堂珍藏

鼎

截至目前為止，從二里頭遺址只發掘出一只銅鼎。1987年在二里頭發掘工作過程於第四期區域發現上述第二只斝的同時，在87 YLV M1號墓中發現了一只鼎。鼎高20厘米，手柄直徑15.3厘米，形體是平底圓形盆狀，薄壁。由三根器物附於下半部中空的三角錐形足支撐。兩側兩根半弧形的拱形把手從頂部口緣互相呼應。器物的形體上部由一根以縱橫交錯的線條淺浮雕飾帶裝飾。



鼎 87 YLV M1

盃

一座高24.5厘米的青銅器在1987年自二里頭遺址一號墓二區出土。屬於二里頭文化第四期陵墓。此青銅器在形態上與同一時期的陶製盃相似。它的形狀如一個圓潤薄壁球狀體，一側是一個傾斜的開口，另一側是一個向上凸起的流口。一條長長的半弧形把手從形體側面中心頂部口緣伸展直至連結下方其中一根三角足的中心。



盃 87 YLII M1

角盃混合物

即使二里頭遺址尚未出現這種青銅器，但當地發現了少量的角盃混合物。它們基本上像後期的盛酒器‘角’形制一樣，但在側邊中間突出那長長的流卻形似早期的盃。形制上幾乎相同的陶器在1965年左右的二里頭遺址有出土，現在藏於河南省洛陽博物館。

中國的博物館收藏了兩件青銅角盃混合物，另外一件則為玫茵堂藏品。

第一個青銅角盃混合物收藏於上海博物館。雖然器物的足已經失蹤，但這青銅角盃混合物不尋常之處在於它的形體下半部裝飾著一個大型的鏤空圓圈，圓圈周邊上下由一條淺浮雕飾帶裝飾，中間部分也飾有兩條用小螺柱狀突起裝飾的淺浮雕帶。

1980年在河南省洛寧出土了第二只光身無裝飾的角盃混合物現保存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第三個已知的角盃混合物是玫茵堂藏品。由戴克成 Deydier Ch. 於2016年在巴黎出版的“Initiation aux Bronzes archaïques chinois” (中國古青銅器入門) 第111頁和112頁中作了介紹。該器物的主體壁薄(1mm厚)底部圓形並往內修。從底部往上延伸漸修窄至頸部下方，後方隨著朝上敞開的口緣翻開，頸部逐漸變寬。

形狀非常長，稍微彎曲並逐漸收窄的流朝尖端的中點正下方延伸。在器物一個平坦側面上，一根長半弧形手柄從口緣正下方伸展往到底座上方。整件器物由三根纖細優雅的三角足支撐，慢慢修窄到盃頭化為尖端。



角盃混合型器物 玫茵堂珍藏





鈴

這些小銅鈴與武器和工具，是二里頭遺址發掘到最早的青銅器之一。這些形制像顛倒了茶杯的鈴體積很小，從7到8厘米高，其一端有小手柄。

在二里頭遺址第二層土壤層（1981年，M4號墓，青銅8號），第三層（1984年秋，2號墓，2號）和第四層（1986 - 1987，古墓M57:3號）各處都出土了不少數量的銅鈴。



鈴

武器和工具

發掘工作發現了大批的青銅武器和工具，包括了戟，戈，斧，箭頭，鑿子，鋸，剪刀，魚鉤以及刀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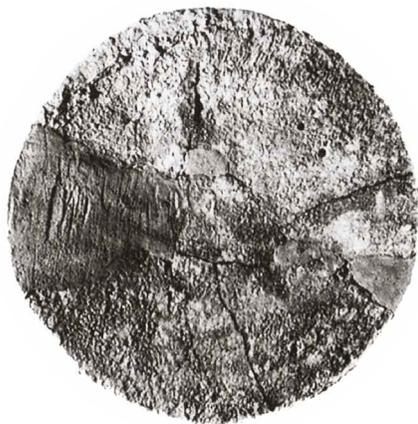
科學化的化驗發現這些器物大多數是由雙鑄模鑄造而成。金屬成分為92%至98%的銅合金與1%至7%的錫混合而成。

大部分的青銅武器都是戟和戈。一些戟的手柄紋飾有雲或抽象動物圖案。有些可能最初鑲嵌著綠松石。從上面出現了的凹槽看來，應該曾經嵌上綠松石。

銅鏡

1975年秋季在二里頭遺址發掘了兩個直徑11.6厘米，厚0.1厘米的扁圓形器物。其中一個表面飾有三個孔。另一個表面則有嵌過綠松石的痕跡。

這兩個器物的形制令人聯想到在中國後期大受歡迎的銅鏡，估計大概是銅鏡最早的祖先或雛形。



早期青銅鏡的遠祖
VI KM4:27

綠松石鑲嵌青銅牌飾

像銅鈴一樣，青銅綠松石鑲嵌的牌飾是二里頭遺址中最古老的出土青銅器之一。1981年，M4墓（第5號）出土的這一塊牌飾可追塑到二里頭第二期的年代。隨後在1984年（M11號墓地，第7號器物，第3號土壤層，1986 - 1987年（M57第4號器物，第3號土壤層））發掘了其他類似的牌匾。在進行這些發掘行動之前，類似的牌飾已經在中國以外的各種收藏中得以保存。

包括了 (D. Singer) 辛格博士 (美國) 的藏品，麻省哈佛大學福克博物館 (Fogg Museum) 的Winthrop收藏品 (美國) 以及檀香山夏威夷藝術學院 (美國) 等等。

這些牌飾總是在陵墓中安放於與死者的胸部齊平或非常接近死者的胸部。而且僅在夏代重要人物的陵墓中才被發現，同時大家可以確定與這些人的屍體埋葬的是總是一大堆令人印象深刻難忘，琳瑯滿目的陪葬品。



牌飾 玫茵堂珍藏





參考書目

查爾斯希格姆斯教授著 Higham C。

- 東南亞地區青銅器時代劍橋大學出版社 199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 二里頭 (1999 - 2006), 第一冊,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14。
- 偃師二里頭1959 - 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中國大百科書出版社, 北京 1999。
- 中國早期青銅文化 - 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科學出版社, 北京 2008。

徐蘋芳, 張光直等著

- 中國文明的形成 - 考古篇附沙拉艾倫序言耶魯大學出版 2005。

韓維同, 丁伯泉, 張寶德等著。

- 河南登封縣玉村古文化遺址概況, 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六期。

譚中和著

- 夏商時代的社會與文化,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6年11月第一版。



戴克成先生既是一位成功的古董商，也同時在學術研究成績昭著。他在學術研究方面成就更超越其他領域。戴克成在學時專攻中國考古學與甲骨文。古至公元前12-13世紀商代的甲骨文為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古人刻在獸骨與龜甲上的文字，成為了曠世經典的甲骨文。戴先生在學術界中以他在中國古青銅器，金器的獨到心得尤受稱許。特別是中國學者對他的成就更加給予特高評價。他的學術研究著作如 *Les Bronzes Archaiques Chinois*, *Archaic Chinese Bronzes - 1 - Xia & Shang*, Paris 1995, *Ancient Chinese Gold* (巴黎 2001),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香港 2013) 等都備受專家們推崇。戴先生自1985年每年都安排舉辦一些以商周代青銅器，金器和銀器為主題的展覽會。